

记得,读小学时候,教我们体育的是林慧老师。我在其门下受业三年,收获无数快乐。彼时,皆称“老师”为“先生”,故,本文称林慧老师为林先生。

入学之后,我在浦东一所乡村小学读书。我既不聪明也不用功,不做作业还要逃课。放学了,野在田头四处游荡,上树掏鸟窝,下河捉鱼虾,直到满天星斗才摸黑回家。所以成绩一直平平,读三年级了依然了无长进。1948年,上海解放前夕,我们举家迁到浦西静安寺附近居住,我也转入位于极斯非尔路上的觉民小学读书。因为成绩不佳,加上没有学过英语,所以只能重读四年级。

这是一所由基督教教会创办的学校,学生家境都比较殷实。校规十分严格,说话必须轻声,行走不准快步。教工全是女性,一式黑色的服饰,还不准谈婚论嫁,否则将被解雇走人。师长态度极其严厉,一旦学生说了粗话,教师们会当众给说粗话孩子的嘴巴涂上红圈,三日之内不准抹去。饭前要

祈祷,餐后要鞠躬。犯规矩被打手心,每周要做礼拜,还要唱诗读经。因为我从小散漫惯了,所以很不习惯这样的生活,也不喜欢这里的师长。

不过,也有例外。教我们体育的林慧先生,却受到几乎所有学生的喜爱与欢迎。林先生,二十来岁,时

尚年轻,充满活力,嗓音甜美,亲切和蔼。

因为她教体育,所以拥有不少特权,比如,穿着紧身牛仔裤,套上宽松运动服。有时,口中还嚼着口香糖。

林先生叫唤我们男孩从来不用学名,只称由她

林先生

贾志敏

杜撰的外号或别名。长得粗壮的叫“泰山”、“哈代”,生得白净的唤“埃洛弗林”、“贾兰古柏”(美国西部电影明星),比较厚道的便称“林肯”、“富兰克林”,抑或叫Mr.张、Mr.李,因为我自浦东来,所以就叫我Mr.浦东。她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林先生简直成了我们一群男孩心仪的女神。她,征服了我们这一帮男孩,也转变了我这个顽童。

那时候,还不时兴做广播体操。林先生不用吹哨子,只需弹着风琴就能指挥——这在当时较为罕见。

出操了,我们踏着她所弹曲子的节奏,从各自教室来到操场。她一曲弹完,队伍刚巧整齐,分秒不差。于是,林先生弹琴我们做操。奇怪的是,她不用回头,居然能洞察操场上发生的一切。那个同学不认真弯腰,哪些小孩在无端吵闹……都会给她逮个正着。原来,林先生在置放琴谱的地方,嵌着一面镜子,她从镜子里能观



本心报国,非冀名禄

顾云卿

明代江西有个学者吴与弼,是崇仁学派的领头人物,一生以传播程朱理学为己任。明英宗为收众人之望,特地聘他入朝,给他一个地位高、待遇好的辅助太子读书的官职。但吴回答“臣少贱多病,久迹山林,本无高官,徒以声闻”推辞了。事后有人问他原因,他念了这样一首诗:“琴到无弦识者稀,人生惟有一钟期。几回拟古阳春调,月满西楼下指迟”,表明了他虽有辅国安民之抱负,却无追逐名利之俗念。

这首《绝句》并非吴与弼原创,经查,作者是宋代的和尚祖可。释祖可,原名苏序,出身书香门第。哥哥苏序,《宋史》有传,也是个有德有才有抱负的青年。他写的《清江曲》得到苏轼赏识,“大爱之,由是知名”。有人将他推荐到皇帝那里,“上特召之,固辞。又命守臣以礼津遣,庠辞疾不至,以寿终。”

这一群人的特点是:一,聪颖早熟,才华横溢;二,爱国忧民,心怀社稷;三,不求名利,甘于淡泊;四,远离尘世,归隐山林。我们不妨将这一群体称为“隐士”,史书列传中专门有“隐逸”一类,这是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阶层。在《宋史》中,《隐逸类》共收录了有名有姓隐士43人。苏序事迹是附于《王忠民传》后面,而王忠民的事迹同样具有以上所讲的4个特点,传记用八个字来作为概括:“本心报国,非冀名禄。”我想,将此作为本文的标题,应该实至名归。

回过头来细品释祖可《绝句》一诗,或有助于我们对这群人精神实质的理解。“无弦琴”最早是隐士先驱陶渊明的创造。据《晋书》载,陶先生“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道家把“琴而无弦”与他们的内丹修炼核心理念结合起来,创造出“大音希声”这一名词,所谓“乐无声兮情逾倍,琴无弦兮意弥在。天地同和有真宰,形声何为迭相待。”(张随《无弦琴赋》)辩证地讲,无与有对立统一,无中有有,有中有无。能够达到天地同和,虽无弦,岂不是最大的“有”弦?故清代又有人说:“朝朝相对没弦琴,不必空劳向外寻。并坐与众弹一曲,人间无上尽知音。”俞伯牙与钟子期是传为千古楷模的“知音”,世间知音不在多,诚如鲁迅对瞿秋白所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就是释祖可等人对自己世界观的表达。他们也愿弹奏《阳春曲》这类积极向上、光明入世的曲子,但是,他们追求的是“下指迟”的演奏方法,即“音生于指,优游弦上,节其气候”,讲究一个“徐”字(即迟慢)。

从积极的角度看,我国隐逸文化并非可以“逃避现实”一言排斥之,他们活法本身也具有不小的正能量。

察到操场上的每个角落。

做操之后,林先生就带领我们跑步,再之后,听凭大家疯玩——这是校园里最愉快的时刻了。更让我们高兴的是,林先生隔三差五地组织班际“司令球”比赛——类似篮球比赛的一项运动。那时候,大家对篮球运动知之甚少——两支队伍进行对抗,一队9人:3个前锋、2个小将、1个大将、2个挡小将、还有1个挡大将。比赛紧张激烈,极其有趣。逢到冠亚军决赛,校园里张灯结彩,像过节一般,师生簇拥在操场四周观看助威。气氛热烈,盛况空前。林先生充当“勒夫令”(裁判),执法时,她将中指和拇指含在口中鼓气猛吹,以代替吹哨,分贝高,效果好。

比赛结束,她用右手打一个“响指”,于是,我们这些运动健儿笑逐颜开,屁颠屁颠地围在她马前鞍后。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那时的我们,绝对是林先生的“铁杆粉丝”。

说来也怪,自从我变得守规矩了,变得爱读书了,成绩自然提高许多。有一次,还被评为“模范生”。胸前挂着个红五星到校园各处炫耀,心里直美滋滋的!

弹指一挥间,3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年代,觉民小学那些海外校友回到上海故土之后,最想拜见的就是这位林慧先生。

林先生栖居在浦东沈家弄路一幢老工房内。她

以前学校门口有一块不大的空地,成了光头卖狗皮膏药的地方。光头长得高高大大,隔三差五会到此地来卖据说是他家祖传的狗皮膏药和跌打药粉。

每次来卖前,光头拉好场子,就会对围观的人来一番点像我后来从电影和小说中看到的老北京“天桥把式”似的开场白,然后把上衣脱了,光着膀子表演单掌劈砖等功夫。有时围观的人把圈子越围越小,光头会操起一条长板凳,抓住一头,自下而上地貌似向围观者抡去,然后在人们的惊呼声向后重重地砸在自己的光头上而脸不变色眼不眨脑袋不开花。

一次,光头正在表演单掌劈砖,小伙伴中的摔跤高手小三子在边上说,这

文化杂咏·小品

胡中行 诗文 孙绍波 图

陈朱合璧最风流,赵凤联珠在上游。已到江郎才尽日,本山之后使人愁。

小品盛日,万人空巷。佩斯时茂,有占尽风骚之能耐;丽蓉汉林,具拥趸无数之魅力。其后则一无可观矣。今之小品,或无聊,或恶俗,即偶有佳作,亦无演技如前辈者。余现时看电视,遇小品即换频道,避之如恐不及。



终身未嫁,与胞弟一起生活。后来,胞弟先她而去,林先生孑然一身。

1999年,有关部门拟组织“特级教师贾志敏从教40周年”的庆典活动。我得知林先生在浦东居住,就登门拜访,盛情相邀。盛典那日,宾客济一堂,林先生应约赴会。半个世纪过去了,她苍老许多,满头银丝,皱纹爬上眼角,步履不如先前那样轻快敏捷,身上特有的青春与活

力已经不再。然而,精神矍铄,气质高雅,我握着她的手,嘘寒问暖。她轻声地、不无自豪地告诉我:“做教师真好……我的学生遍布天下。现任香港特首董建华也是我的学生。”

她的发言简短有力,获得的掌声热烈持久……

砖头大概是用胶水黏起来的。没想到光头居然能听懂上海话,他眼睛一瞪,把小三子拉进圈子里说,小师傅你来试试吧。小三子胆子也大,把袖子一卷就使劲猛捶砖头,最后连脚也用上了,砖头还是完好如初,只好红着脸退了下去。

光头得意了,抡起手臂一掌下去,砖头顿时四分五裂。

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一位拄着拐杖走路一瘸一瘸的老先生,经过光头一番按揉外加拔了一个火罐贴了一张狗皮膏药后,竟能丢掉拐杖走路了。围观的大人中有的说光头还真有两下子,但有人说那老先生可能是光头的“托”。时过境迁,只能是我永远无法解开的“谜”了。

卖狗皮膏药的光头

王纪铨

《社会》杂志是在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亲自关心下创办的。从1981年创刊直到2005年4月他去世的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费孝通一直关心着《社会》,他对《社会》杂志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粉碎“四人帮”后,费孝通再提社会学的重建,并发表《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受到决策层的重视,社会学在中国大陆得到恢复。1980年1月,费孝通出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同年4月复旦大学分校设置中国大陆恢复社会学后最早的社会学系;翌年,在费孝通、于光远等的关心下,创办了中国大陆最早的社会学专业刊物——《社会》(社会学丛刊),李庆云为第一任主编。

从创刊号的文章《社会学系的培养目标》(以下简称《目标》)开始,费孝通在《社会》杂志刊发的论文、谈话记录等,共有十三篇,此外他还为杂志创刊周年庆题过两次词。

在《目标》一文中,费孝通直接对社会学在各主要发达国家中的现实作用切入,思虑缜密,条分缕析,层层推进他的论述。大致涉及的话题有:尽快恢复招生、加快培养新人;培育公民常识,为未来民主生活奠定基础;追求愿望,把握命运;关于提高研究方法,要重视传

费孝通与《社会》杂志

路英浩

急”、“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江村五十年”和“社会学的历史使命”,则可以看做是重新展开他自己一生极为关注的课题——志在富民,小城镇研究。

1998年第二期《社会》刊发的费孝通“认真解决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一文是根据费孝通于1997年10月14日对《浦东城市化中的农民问题》课题组成员的谈话整理而成,那是针对那个时期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的。

费孝通《社会》杂志两次创刊周年庆所作的题词,一次是他于1996年9月为《社

爱尔兰导演约翰·卡尼,是描绘音乐和爱情的高手,继《曾经》(歌曲改变人生)之后,他又执导了《初恋这首情歌》。如果说,《曾经》镜头对准一个街头歌手和一个已婚女子,音乐让他们产生了复杂、不可言说的异国情愫,他们互相爱恋又各自离去;《歌曲改变人生》呈现迷失在生活中的男女主角微妙的情感世界,通过音乐,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激励、互相依存,最后又重新出发;那么,《初恋这首情歌》则聚焦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音乐把他们连接,给他们动力,让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劈波斩浪。

这是导演约翰·卡尼对少年往事的追念,对逝去记忆的追寻。他说:“我小时候,有个姑娘,我12岁,她13岁,我每天都看到她,但是没有勇气问她的名字。”30多年后,导演终于在自己的电影里,让男主角康纳实现了自己的愿望:15岁的康纳,见到了16岁的女孩拉菲娜,立即被她吸引,她大胆地走向她,宣称自己有个乐队,要为她拍视频。

如同导演约翰·卡尼小时候受到其他同学冷眼,本片男主角康纳由于家庭经济出了状况,在转学到一所新的教会学校时,也受到同学、校长的欺负。他是一个弱小者。但当他打算筹建一个乐队,用音乐去追求心爱的姑娘时,马上变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电影中有一个对比。随着镜头摇移,康纳行走在路上,背后是不良学生的扭打、抽烟,他脸上呈现出不安、怯懦、惊恐的神色。他被校长勒令脱去棕色皮鞋(学校规定只能穿黑色皮鞋),他穿白袜子的双脚,行走在学校的地板和室外的污水里。这明显是对人的侮辱,康纳却只能忍受。相反,面对拉菲娜,一个辍学的女模特,他心中的女神,对她脱口而出自己有个乐队时,脸上全是自信的表情。要知道,那时候乐队还是子虚乌有的影子。当那个拼凑起来的“唱街乐队”开完会,所有队员出门,导演用了一个富有意味的慢镜头,他们脸露笑容,飘飘欲仙,就像是还没打仗就已胜利的士兵。音乐让他们了解自己、相信自己、尊重自己。

第一次拍摄音乐视频就露出窘状:没有专门摄像,服装不统一。但康纳的导演和拉菲娜的表演,赢得康纳哥哥布兰登的赞赏。布兰登是电影里很重要的角色,他看起来是一个瘾君子、大学辍学生,但他懂音乐,是康纳音乐的启蒙人,指导者:他告诫康纳不要翻唱其他人的歌;他说想象力在艺术中是最重要的;他叮嘱弟弟要高瞻远瞩;他把当时热门、流行的乐队介绍给康纳;他让弟弟通过聆听、揣摩大师的演唱和演奏来获得灵感。通过布兰登,我们知道上世纪80年代许多著名乐队,他不仅为康纳,也为我们打开音乐之门。电影中所有的歌曲,都带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本片是贴着怀旧标签的初恋情歌,就像《曾经》(歌曲改变人生),每首歌曲都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拉菲娜是康纳的爱慕对象,康纳用一首首自己创作的歌,表达着内心的情感,这些歌,总有一个“她”,这些歌,勾连起整个剧情。《谜一样的模特》是他初识她的感觉;《向上》是他对她的思念和表白;当他知道她要远走他乡,吟唱了《美丽的海》;在她将要去伦敦的前夕,他用《就像是偷来的那样驾驶它》来祝福她:“你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你必须抓住方向盘,当自己的主人。”学校新年晚会上,他抒情地唱着慢歌《寻找你》,交叉镜头里,是她感动落泪的面容。

康纳和拉菲娜最终走到了一起,电影结尾,他们决定去英国发展,虽然他们没有钱,没有熟人。电影画面里,康纳在风雨中驾驶着小船,凭借着年轻、理想和爱情,小船,怎么不会载着他们驶向幸福的彼岸?

《社会》杂志创刊15周年庆题写的“洞察社会的窗口”,另一次是费孝通于2001年6月为《社会》创刊二十周年的题辞:“研究社会 服务社会”。

进入新世纪后的2000年,费孝通在《社会》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第七期的“我们要对时代变化作出积极有效的反映”,另一篇则是发表在第十期上的“社区自理开篇”。《社会》杂志最后一次刊发费孝通本人的文章是在2005年最新改版的第一期上,题目为《中国乡村考察报告》总序,实际上该文是费孝通在一年前即2003年12月5日为由刘豪兴教授所著的《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苏南七都》著作写的序言。

在该文中,费孝通仍然念念不忘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他说“一百多年来,社会学在中国历经坎坷,先天不足,后继乏人,还有不少问题 and 困难。”这说明,他的确时时处处心系着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当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社会学这棵大树正在茁壮成长时,我们不得不由衷地敬佩费孝通的巨大贡献。

本刊中国科学院院士裴钢与《细胞研究》的故事。

